

方朝晖 著

重建价值主体

——卡尔·雅斯贝斯对近现代西方
自由观的扬弃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重建价值主体

——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通向一个全面客观世界观的漫长历程》的西方

方朝晖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3 号

重建价值主体

——卡尔·雅斯贝斯对近现代西方自由观的扬弃

方朝晖 著

责任编辑：于 沛

封面设计：杨德有

出版者：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9 号)

电话：6096197

邮政编码：100032

印刷者：北京雁栖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40 千字

版次：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7 304-00811-3/B·19

定价：8.00 元

KARL JASPERS:
A RECONSTRUCTION OF MAN AS FREEDOM
with sublation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concepts of freedom

A study on the *Existenzphilosophie* of Karl Jaspers
Fang Zhaohui, Ph. D.

你从你心之田里^①
挖出青春的种子
种在我荒芜的心里
于是，在我的心田里
长出青春的花蕾
花朵向你徐徐开放
香馨在你满是皱纹的脸上
永久地萦回

^① 这是我的故友、大学同学陈和的一首旧作，现录于此，作为对他的深刻纪念。

本书承武汉吉达金属化学有限

公司总经理贾荣东先生

赞助出版

序 言

方朝晖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重建价值主体——卡尔·雅斯贝斯对近现代西方自由观的扬弃》即将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专著出版，他从北京来信，要我为此书写序。作为他作博士生时期的指导教师，我对他的这一论著能如此快地出版感到由衷地高兴。为之写几句话并顺便就对雅斯贝斯等西方现代哲学家的学说的研究问题简单地讲点意见，也是一件乐事。

方朝晖同志本科是在华东理工大学(原名华东化工学院)读的，1986年获工科学士学位。由于爱好哲学，他在同年报考了复旦大学哲学系，被录取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他在作硕士生期间的学习情况我知之甚少。他当时的导师李继宗教授以及其他同届的一些研究生偶尔与我谈起过他，没有引起我多大注意。直到1989年初，他来找我，表示希望完成硕士阶段后转作西方哲学专业博士生。这才使我感到必须对他各方面都有所了解。当时在教师和研究生中对他褒贬不一。老实说，对一个本科阶段读工科，硕士阶段也未系统学习过西方哲学课程的人是否适宜于作西方哲学专业的博士生，我是有过疑问的。但在与他面谈过几次后，这种疑问大体上打消了。与西方哲学专业的优秀硕士毕业生相比，他当时对西方哲学专业知识的掌握的确略有逊色，但我发现他有如下几点优势：一，他认真研读过马列哲学的许多经典著作，马列哲学的功底较好；二，他的知识面较广，特别是对科学史和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较好的了解，视野开阔；三，他对英语有较好掌握，不仅能熟练地阅读，听说能力也很不错；四，他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善于分析和提出问题；五，他的求知欲和事业心都相当强烈，有不在哲学研究上作出较好成绩绝不罢休的气概。我以为

这些优势比单纯的西方哲学知识更为重要。只要能发挥这些优势，他完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克服专业知识不足的缺陷。他后来在作博士生时的学习进展情况正是这样。

由于方朝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语功底都较好，入学作博士生后，有关这方面的课程他都很顺利通过了。在头一年略多的时间内，我建议他集中力量较深入和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及现代西方哲学，他在这点上作得相当出色。学习进度相当快，效果显著。他那时写的几篇有关西方哲学的读书报告虽还说不上有很高水平，但也都颇有见地，看得出他学习刻苦。在往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他撰写和发表了近十篇论文，他的这些论文虽不见得都是上乘之作，细心和严格的读者甚至可从中发现某些疏漏及粗糙之处，但他大都能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特别是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一个由自然科学转向哲学时间不长的青年人来说，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我估计，与同一时期本学科的其他博士生相比，方朝晖大概不会有有多大逊色。

由此我又想到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取舍标准问题。我国现行的研究生录取标准基本上是考生入学考试得分的高低。其中专业考试大体上是根据考生对本专业的基础知识问题是否回答正确来评分，有些学校（如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部门还要求教师对所出试题拟一份标准答案作为评分根据。这大体上类似中学生考大学的方式。这种方式当然不无优点，在中国现有条件下，甚至还不得不这样做。但这么做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论哲学这样的学科难有统一而又准确的标准答案，即使有，考分的高低也并不见得能正确地测量考生能力的高低。高分低能与低分高能的现象是经常存在的。一些有才华的学生往往由于不习惯背诵教科书而考分不高。如只是死扣考分，他们很可能遭到淘汰。我一直认为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考察来说，总体的能力和素质的高低也许比对具体专业问题的回答的全面与否更为重要，至少对哲学这样的学科是如此。作为一个教师，我当然不能违背招生行政部门的

有关规定,我所能作的只是使试题更具有灵活性,使之尽可能起到检验考生治学能力的作用。在提出录取与否的意见时,尽可能参照考生已有的科研成果以及与之交谈的印象。我觉得这样似乎更全面一些。方朝晖是根据李继宗等教授的推荐以及我对他各方面的综合考察而报请直升博士生的。他这几年的学习表现正是我们原来所估计的那样,可谓不负众望。我的其他几个研究生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去年我到欧美一些大学访问时,特别注意他们录取和培养研究生的方法,使我印象最深的也正是他们特别关注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并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应的制度。但愿我国的研究生培养也能形成一套较为适当的制度。

回头再来就方朝晖同志这部作为专著出版的博士论文说几句话。

记得在最初与他讨论博士论文的选题时,为了发挥他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较为熟悉的特长,我曾建议他考虑选择有关西方科学哲学的问题作为选题,尽管我个人这方面的知识较为欠缺。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表示宁肯选择人文哲学方面的题目。他自知对人文哲学较不熟悉,研究起来困难较多,但这样可以更加鞭策自己努力克服弱项,做到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我当然赞同他这种知难而上的精神。不过我主张他先不必确定具体的题目,等研究一个阶段以后选择自己最有心得的问题。他同意了 my 建议,广泛涉猎了西方哲学各家各派有关主体性、价值、自由等方面的理论,并力图发现和揭示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在做博士生时期发表的一些论文大都属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最后他选定了雅斯贝斯哲学作为突破口。这不仅是考虑到雅斯贝斯哲学在我国研究得不多,也考虑到雅斯贝斯这方面的理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具有作为重要交汇点的意义。关于他写作这部论著的指导思想,他在前言中已作了交代,我不必在此赘述了。但有一点我想提出来强调一下:他不是孤立地阐述雅斯贝斯的思想,而是把雅斯贝斯思想放到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广阔背景

中去加以分析，弄清其来龙去脉以及各种复杂的关系。这样他就能更深刻地揭示雅斯贝斯思想在近现代西方的地位和意义。这种研究和分析的方法也正是我近年来一再向我的研究生推荐的方法。我深信，与那种虽大量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术语却只是将某一西方思想家进行孤立地研究的方法相比，这种研究方法也许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由于出国访问，我未来得及参加方朝晖同志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回国后翻看了会议记录及多位同行专家的评审意见书，发现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肯定论文在这方面的长处。专家们还对论文的其他一些长处作了适度的肯定。例如，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雅氏原著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证充分、具体，有很好的说服力；文章的框架合理，文字表达流畅；更重要的是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自己的研究，等等。专家们也指出了这篇论文的某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主体性的价值意蕴强调得有些过份，对雅氏哲学思想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 and 意义的评价有些偏高，有些地方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仍失于笼统。我相信，方朝晖同志会从专家们正反两方面的这些评价中得到鼓励和鞭策，这无论对于他对本论文的进一步修订以及以后他进行其他研究，都是大有教益的。

《重建价值主体……》一书很快将与读者见面了。我没有必要在此再多说它的短长。读者们自会根据自己的体会去对它进行评判。我想就我们应如何对待像雅斯贝斯这样的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再简单地讲点想法。

我国哲学界公认雅斯贝斯是存在主义的三位大师之一。不过，与对海德格尔和萨特的研究相比，我们对雅斯贝斯的研究要薄弱得多。他的著作译成中文的只是几个片断，甚至对这些片断，人们也往往疏于深入探索其真实含义，因而在评价雅氏思想时，牵强附会的状况比比皆是。例如，雅斯贝斯同海德格尔一样拒绝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存在主义，而宁肯称为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其实，他的生存哲学不仅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不同，与海德格尔的生

存哲学也有重要差别。而我国哲学界往往只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性”，而忽视了他们的“个性”。人们由于把存在主义当作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而简单地把雅斯贝斯的哲学也当作非理性主义，由批判存在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观而把雅斯贝斯的自由观也当作极端个人主义；因批判宗教神学而简单地把雅斯贝斯哲学中的“上帝”概念与传统神学的上帝相提并论，等等。对雅斯贝斯哲学这种解释不仅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而且会造成不良的实际影响，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格格不入的。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雅斯贝斯等西方哲学家的学说进行深入、具体、细致的研究。

我们当然应当看到，1979年以后的十余年中，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考虑到我们是从近乎零开始的，这种进步的意义就更是值得称道了。这种进步在最近几年也许更为突出，不仅至于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而且在着手进行较深层的研究。但是，这一进程后来似乎变得缓慢起来。1989年以后的这几年，这一进程近乎停滞了。尽管在适应教学需要的名义下继续有大量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教材和参考书出版，但它们大都是在原有水平上重复，真正具有体现这方面研究的新进展的读物少见。其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政治上的过多干预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用无疑是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研究方式的未能及时转型大概也不无重要影响。

在1979年以后的头几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貌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例如首先搞清楚有那些思潮和流派，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各有哪些代表人物。当时首先出版的几部教材和参考书，大体上都是服从这一目标。它们大都把现代西方哲学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或者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两大主要思潮，即把众多的哲学家归属于不同的哲学流派，又把这些流派归属于这两大思潮之中。这就是说，当时人们关注的是不同哲学家以

至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共性。至于对这些哲学家的理论的各自的特色,即个性那时可谓还未来得急去多寻问。这种概略式的、一般化的研究是符合当时的需要的。但是,它毕竟具有简单化、粗糙化的弊病。如将其绝对化,当作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某种固定的模式,那就会误解、甚至歪曲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因为,即使在那些被公认为属于同一哲学流派的哲学家之间,他们的学说的区别有时也是相当大的,甚至相互对立。类似雅斯贝斯、海德格尔那样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的情况并不只是个别的。皮尔士早就因不满詹姆士的学说而抛弃他首先倡导的“实用主义”这个名称,乔姆斯基、福柯拒绝称自己的理论为结构主义。至于“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等称呼的含混性和不确定性,就更为明显了;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的情况时有发生。正因为如此,西方哲学界对现代哲学的研究似乎越来越看轻它们作为派别而存在的意义;在继续寻找不同哲学家的理论的“共性”的同时,特别强调他们的“个性”。他们认为,正是各个哲学家的理论和这种特性,才是丰富和发展西方哲学的重要契机。我想,为了克服我国哲学界两年来对西方哲学研究进展缓慢,甚至相对停滞的局面,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由一般性的研究转向对不同西方哲学家的特殊理论的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可以甚至应当和西方哲学界当前的研究接轨,至少应当借鉴他们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由按流派思潮进行的较为一般性的笼统的研究转向对不同的哲学家的特殊理论的具体的研究,不只是单纯的研究方式的转型,它包含了认识方式的某种深化过程。后者比前者要困难得多,它要求研究者有更强的分析和观察的能力。近几年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出现迟缓甚至相对停滞的局面,与上述转型中所遇到的困难不无密切关系。对于我们这些年岁较大的人来说,这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也许更多一些。值得庆幸的是,已有一些青年同志在进行着这种更高层次的研究。近几年所看到的一些青年同志所写的博士论文,大都属于这种较深层次的研究。而且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论著具

有较高学术水平,方朝晖同志的《重建价值主体……》大概可属这种论著之列。我想我们这些年岁较大的教学和研究人員,有关领导和书刊出版部門以及广大讀者,都应当欢迎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共同来推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

刘放桐

1993年5月10日于复旦大学

前言：追求自我的完整 呼唤生命的尊严

——卡尔·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

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永远也说不清楚的话，那么我想这个东西大概就是人了。千百年来，哲学家们争相谈人，政治家们争相谈人，宗教牧师们争相谈人，平凡的百姓们也争相谈人……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个问题上给人类一个完满的答案，于是人的问题也就成了人类永远也议论不完的话题。翻开一部人类史，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斑剥陆离、五色纷呈的画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既有血肉横飞的凄惨景象，又有万众欢腾的壮观场面；既有生与死的较量、血与火的斗争，又有平凡的忙碌和真挚的友爱。多少人春风得意，倚权仗势，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又有多少人任人宰割，倍受欺凌，一生生死都操纵在他人之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挣扎，我们沉浮；我们为生计而奔波，为各种烦恼所困扰。多少人营营苟苟，挖空心思，极尽人间钻营之能事；多少人忠诚老实，心地善良，一辈子守着那平静似水的家园；多少人飞扬跋扈，仗势欺人；多少人襟怀磊落，心底无私；多少人时运不济，历尽艰辛；多少人一帆风顺，享尽幸福；多少人长歌当哭，多少人欢笑声声……夜阑人静的时候，每当我们扪心自问，此生此世，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所为何物，意义何在？这时我们也许会感到一阵颤抖或深深的不安，有谁能说他对人的存在和价值得出了一个完整的解答呢？

卡尔·雅斯贝斯 (Karl Jaspers, 1883—1969) 1883年2月23日生于德国北海沿岸的奥尔登堡，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医院工作，从事精神病理学的研究和实验。

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从克尔凯郭尔开始研究哲学问题，1919年发表著名的《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获得了巨大成功，从此他被公认为当代西方存在主义思潮在理论上的奠基人（后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曾多次引用这本名著）。在此后得数十年间，雅斯贝斯曾先后发表了《哲学》（三卷本）、《时代的精神状况》、《哲学的世界历史》、《生存哲学》、《哲学信仰》、《论真理》、《历史的根源与目标》、《我们时代的理性与反理性》、《理性与生存》等数十部重要的哲学及其它方面的著作。人们通常倾向于把他看作当代西方存在主义思潮中与海德格尔、萨特并列的三位大师之一，其实雅斯贝斯强烈反对“存在主义”，他的思想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讲都远非存在主义所能包容的。

雅斯贝斯的哲学活动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又由于妻子是犹太人的缘故而倍受虐待和折磨，整整12年间（1933—1945）生活在极度的愤怒和痛苦中。两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极为深刻地影响了雅斯贝斯哲学思想的形成。正如他自己后来在自传中提到的，战争把每个人的灵魂和内心世界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人背信弃义，出卖忠良，昧着良心去干那些惨绝人寰的事情，或者打着仁爱的旗号去干卑鄙肮脏的勾当；在战争中，丑恶和黑暗宛如死海里的泡沫一般都在一夜之间纷纷涌现出来，人与人之间那种虚伪可耻的较量和你死我活的斗争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促使他去深入地思考应该怎样来重新理解人这个既异常简单又无比复杂的东西。雅斯贝斯由此得出，哲学的根本使命不在于去给人们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体系，更不在于去承担为所有的人提供终极归宿这样一个本来它承担不起的重任，而在于告诉人们人生的某些真谛，告诉人们人应该怎样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良知，面对他人的存在。任何真理一旦被绝对化就容易成为扼杀人性的牢笼，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资利用的幌子。教条的真理说教培养出来的不是真诚而是虚伪，不是真理而是谬误，不是和平和友

善而是丑恶和战争。生存哲学力图阐明，人生的真谛在于，人应当₂在世俗生活中不断地返回到心灵的深处，通过观照自己的本来面目使自己获得生存的信心和勇气；人应当敢于冲破一切权威和信仰的囚禁，敢于超越于一切当下世俗生活的沉沦状态，在理性的自我反思中创造自己，把握自己；人们只要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就容易把握自我，赢得尊严。

千百年来，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宗教教师们都在试图为人类描绘一个理想的蓝图，喋喋不休地向人们许诺一个让人人都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新世界的即将来临。可是，现实永远是那么灰暗和无情，到处充满着血与火的斗争。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在那些冠冕堂皇的爱的宣扬和说教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恰恰是大量的虚伪和罪恶。在雅斯贝斯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人本身的误解。在西方思想史上，从柏拉图、奥古斯丁、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直至尼采等许多现当代哲学家都试图把人性归结到一种绝对真理的体系中去，认为这是通向人类理想家园的阶梯。然而无论是以康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理性主义，还是以尼采、萨特等人为代表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在理解人的时候都犯了绝对化的错误。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产儿，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古希腊，但是其成熟形态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才正式发展起来的。这种理性主义尽管曾经辉煌一时，但终于逐渐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工具的合理性，它把人当成了机械抽象的原子固定下来，使每个人的存在和价值都不得不按照某些抽象的外部法则和整体功能需要来割舍和塑造，从而导致了₂对人的扼杀。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批判在西方早在帕斯卡尔等人那里即已开始，后经谢林、克尔凯郭尔、尼采、马克思·韦伯等人发扬光大并被雅斯贝斯所继承。但是与此同时雅斯贝斯又发现，这种批判带来了非理性主义的盛行和自我中心主义(egoism)的发展，由于它们把个人绝对化，把抽象的自我绝对化而走入了困境。雅斯贝斯认为这种倾向尤其在以萨特为代表

的现代法国存在主义思潮中获得了重要的展现。他指出，萨特等人由于把人的阐释和自我的阐释绝对化结果把人从世界中孤立了起来，人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从此再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精神的依托和忠诚的伙伴。既然生存等同于荒诞，世界就是丑陋的象征，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因此雅斯贝斯主张必须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和阐释人。诚然我们决不能为所有人找到一个永恒的终极归宿，但是哲学可以发现人生的某些真谛，它们作为人类的伟大智慧，无疑有益于人的自我拯救和解放。人不是一个抽象的绝对物，而是一个生动感性的动态过程；既有着无限丰富、复杂和矛盾的心态，又有着心灵深处对于自由的无限渴望。人是丑陋的，但又崇尚善良；人是虚伪的，但又向往真诚；人是堕落的，但又追求崇高。对于人来说，向他们许诺一个理想的新世界诚然荒唐可笑，但是如果认为美好、自由和善良的事物不存在也不切实际。哲学家应向人们揭示人们是如何在现实中发现光明，在腐朽中创造出神奇的，这正是哲学的真正力量，也是生存哲学力图展示的东西。

雅斯贝斯认为，现代世界对于人是极其不尊重的，它那丑恶、虚伪的面目把无数个无辜的生命困扼在牢笼之中，使其只能以极其变态、极为畸形的方式成长和发展。对这个物欲横流、良莠并存的世界，我们既不能一味地抱怨叹息，也不能同流合污，自暴自弃，更不应该给自己套上几层虚伪的面罩，违背良心地把残害、摧残他人当作自己的乐趣；而应当敢于直面自己的本来面目，充分地把握自己、尊重和理解他人，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纯粹的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的尊严和自我的完整从来不是由任何外人恩赐的，而只能靠自己去奋斗和创造，为此人应当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惨重的牺牲。命运可能是不幸的，但正是在不幸之中往往能开出最幸运的生命花朵；生活可能是丑恶的，但是人性的美丽光彩往往正是在丑恶之中最动人地闪现出来的；人是堕落的，但正是在堕落之中人能真正认识自己，从而超越自己，